

关于四川三台出土“官”款白瓷的几个问题

易 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作为 10 世纪前后北方窑场出产、且属当时社会高档用瓷的“官”款白瓷器，在四川地区的出土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本文根据四川三台出土实物，结合各地的相关材料，对这类瓷器的时代、窑属、使用情况及“官”字的含义作了探讨，并分析了四川地区所出“官”款白瓷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官”款白瓷；窑属；“官”字含义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1-0060-05

《四川文物》1996 年 1 期曾刊载过三台县文化馆馆藏文物中的两件“官”款白瓷器，据称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当地煤建公司在煤场内修建房屋挖方时发现于一陶缸之内^[1]。两件作品器形为盘和水盂，前者口沿呈三莲瓣式，瓣尖微突，内壁花瓣相接处各作出一道短直棱，斜腹较浅，圈足，通体素面无纹饰；后者则呈敛口鼓腹状，亦为圈足底，外壁一周刻划有相连的四朵双线浪花^[2]。从文字描述可知，两件器物胎质洁白细密，釉面白中泛青黄，所见“官”款均位于外底正中，字为阴文，且系上釉后于入窑装烧前刻划，故有的笔画还被流釉所覆盖。

其年代的审视需要依据器形及其它相关材料。首先，与三台县所出三莲瓣口式盘造型上完全一致的作品即见于江苏连云港五代王氏墓^[3]（吴大和五年，933 年），而另一件水盂敛口鼓腹圈足底的特征也同河南洛阳高继蟾墓（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白瓷盖罐（图四）^[4]较为近似。其次，除四川的例子外，全国其他省市历年的考古工作中也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官”款白瓷器，分布区域包括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陕西、湖南长沙及浙江临安，其甚至还一度远播到外蒙哈喇和林、朝鲜半岛庆州、埃及福斯塔特（Fustat）等地。为便于说明，兹将这批材料罗列成表：

一、时代考订

由于两件遗物的出土情况并不明细，因而对

“官”字款白瓷出土情况一览（四川省以外）

序号	年代	出土地点	器型及数量	注释
1		河北邢台 02XYM1	碗(1)	[5]
2		河北定州尧方头村	梯形枕(1) 罐(1)	[6]
3		河北定州卢庄子墓	盏托(1)	[7]
4	977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	碗(3)、碟(6)、盘(2)、盏托(2)、盆(2)、净瓶(3)	[8]
5	995	河北定州净众院塔基	盖罐(1)、罐(1)	[9]
6		河北香河	花口注碗(1)	[10]
7	958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夫妇墓	碗底残片	[11]
8	1013	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基	盖罐(1)	[12]
9	959	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驸马墓	花口碗(2)、花口盘(2)	[13]
10		内蒙古赤峰大窝铺墓	叶形盘(4)	[14]
11		内蒙古巴林左旗宝泉营子墓	盘口穿带瓶(1)	[15]
12		巴林左旗辽上京城址	盘口穿带瓶(1)	[16]
13		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罕山 M1	器底残片(1)	[17]
14		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罕山 M2	器底残片(1)	[17]

序号	年代	出土地点	器型及数量	注释
15		内蒙古巴林左旗太平庄墓	盏托(1)	[16]
16	1005	巴林右旗罕大坝墓	碗底残片	[18]
17	1018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	盖罐(1)	[19]
18		辽宁建平朱碌科墓	碗(1)、盘口长颈瓶(1)	[20]
19		辽宁义县邵家屯墓	碗(2)	[21]
20		辽宁北票扣卜营子墓	折肩壶(1)	[22]
21		辽宁法库叶茂台 M7	碗(2)、花口盘(2)	[23]
22		辽宁康平后刘东屯 M2	注壶(1)	[24]
23		辽宁北票水泉 M1	花口碗(1)	[25]
24	1020	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墓	盖罐(1)	[26]
25		陕西西安火烧壁窖藏	花口盘(26)、碗(6)、甑(1)	[27]
26		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	碗底残片(1)	[28]
26		陕西靖边统万城址	碗(1)	[29]
27	900	浙江临安钱宽墓	碟(10)、盘(1)、杯(1)	[30]
28	901	浙江临安钱宽之妻水丘氏墓	花口盘(1)、杯(1)、注壶(1)	[31]
29		湖南长沙 58 长·树·铁 M1	盒(1)	[32]
30		湖南长沙 58 长·新 M6	盒(1)	[32]
31		湖南长沙 78 长·科 M31	碟(1)	[33]
33		蒙古国哈喇和林城址	不详	[34]
34		韩国庆州皇龙寺遗址	器底残片(1)	[35]
35		埃及福斯塔特城址	盘底残片(1)	[36]

注：表中所列未包含窑址出土物

从表列纪年材料看，这类作品最早出土于浙江临安钱宽墓^[37]（唐光化三年，900 年），最晚则属于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墓（辽开泰九年，1020 年），流行时间从晚唐至北宋早期^[38]，延续长达一百二十年之久。另一方面，无纪年单位所出者根据对遗迹与作品本身造型风格的考察也可知大致相当于这个时期，如陕西靖边统万城系于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年)废毁^[39]，当中遗物的年代下限似应至此；内蒙古赤峰大窝铺墓白瓷盘通体呈三角叶形，内底模印出一展翼的蝴蝶，同形制的作品也见于湖南长沙十国楚墓^[40]（长·牛 M19）；辽宁康平后刘东屯 M2 葫芦形注壶器表刻划多重莲瓣纹，此种装饰手法则主要流行于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就此而言，三台县出土的两件“官”款白瓷似应当属这类产品中较早的个体，即年代约在十世纪前半叶的五代之际。此外，鉴于三台县所出“官”款三莲瓣口式盘也见于陕西西安火烧壁窖藏，故以往发掘者将该遗迹年代推定为唐代晚期的看法或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二、窑口归属

表列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器形以碗、盘类居多，且大多胎质细白坚致，釉色白或白中闪青，除少数几件系直接刻划款识于露胎底部外，其余作品均为施釉后入窑装烧前将铭文阴刻

于器底，这些特点都与前述三台县出土物较相吻合，故可推测应出自同一窑口。对于“官”款白瓷的窑口归属，学术界历来意见不一。主流的观点认为这类瓷器系河北南部定窑所产，属当时适应官方特殊需要制作的精细瓷^[41]；有的则根据辽代墓葬中出土尤多，且赤峰缸瓦窑址还发现“官”款窑具的情况，进而主张有产自辽官窑的可能^[42]；浙江及湖南晚唐五代墓的发掘者更提出两地亦分别烧造部分“官”款白瓷的看法^[43]。然而，若以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浙江及湖南两地窑场于晚唐至宋初时期尚未有细白瓷器生产的迹象^[44]；缸瓦窑址虽曾出土过窑具，但是否生产这类瓷器仍需更多的证据予以明确。定窑所在原属定州，其地自古以来民间多精工巧艺，而易、定、成、德、卢龙两雄藩之间，晚唐时处义武军节度范围内，尽管在长期的动乱中曾屡罹兵祸，但平靖时多，加上统治阶级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视，如王处存任时“睦邻以礼，优抚军民，折节下士，人多归之”^[45]，其弟处直为易州刺史时则“民穿五袴，政治六条，声绩遐彰，口口丝纶复出”^[46]，故“定州工艺”不至歇废，转而更趋向精细^[47]。此外，曲阳灵山盆地所蕴含的丰富瓷土和釉料资源也提供了大型窑场所必备的原料供应体系^[48]。现藏于曲阳北岳庙、刻立于唐永贞元年（805 年）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记德之

碑》，其碑阴处铭文中记录有当年助钱建造影堂的众功德主姓名^{〔49〕}，从所载的“□□窑等三冶节度总管”、“都知瓷窑等三冶判官”、“瓷窑都虞侯”及“□□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等官职看，曲阳灵山一带至迟于九世纪初前后已存在着规模与质量颇为可观的烧瓷作坊。相应地，定窑窑址内也确曾出土“官”款白瓷的完整器及残片^{〔50〕}，且该窑晚唐五代时产品的胎釉、造型特点也与各地所出者多有共通之处，故从宏观上讲，定窑是这类“官”款白瓷的主要产地。需作提及的是，近年来河北省南部的井陉窑^{〔51〕}和内丘邢窑址^{〔52〕}都陆续发现有“官”款白瓷残件，且邢台一带的墓葬中还有个别出土（如邢台 02XYM1 等），因此其实际的窑属可能并不单一。

三、考古所见“官”款白瓷器的使用情况 及对“官”字含义的理解

三台所见的“官”款白瓷原生状况不详，仅根据出于陶缸之内的情況判断，其可能属于窖藏的遗物。至于其它地区出土物，绝大多数则都见于墓葬，所属不仅有中上层等级人物，亦包括一般的庶民阶层，且个别作品如辽宁北票水泉 M1 白瓷碗明显已烧造变形，这些现象均与以往研究者多将此类器同当时之官窑对应的看法相悖。针对于此，有研究者认为其与唐宋时期的贡瓷制度不无关系，即窑场的成品一方面可为地方官员^{〔53〕}通过遴选以“和市”、“和买”等方式购得入贡宫廷，另一方面也经由市场提供给一般的消费^{〔54〕}，而如《宋会要》所记：“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捡桩贡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值出卖”^{〔55〕}，可知宫廷用瓷也曾贩卖流入市场。

对于“官”字究竟有何涵义，目前的见解有较大分歧。一说“官”系光禄寺下属机构太官署的简称，为太官署在有关瓷窑定烧的标志^{〔56〕}；另两说则都基于越窑瓷器上发现的“官样”款^{〔57〕}，其一认为“官”字可理解为象征贵族品味、宫廷样式的所谓“官样”，具体做法是大量模仿金银器的造型^{〔58〕}。换言之，官款瓷乃是作为金银器的替代品而生产的；也有研究者将官款与唐宋时期中央“作样”颁诸州、地方，“州县长莅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样输京都”的官定实物赋税标准相联系，指出所见的“官”、“新官”铭即是代表官样和新官样^{〔59〕}。此外，就官款铭于北宋初以后消失原因的解釋也未有定论，或视官款瓷为介于唐代土贡和北宋中后期“禁廷制样需

索”之间的过渡产品^{〔60〕}，暗示官款的消失可能与北宋后期官窑制度的逐步确立有关；或从文献角度考证应系宋初以后官物采购制度的变化所造成^{〔61〕}。

四、四川地区出土“官”款白瓷的时代 背景、输入途径与因素

上述三台县出土物在四川地区并非孤例，199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对成都市区东南的江南馆街唐宋遗址进行考古勘探时，亦发掘出土一件“官”字款白瓷作品，其器形为瓶，盘口、细直颈、球腹、圈足，胎釉特点同样具有北方定窑系的风格^{〔62〕}。

针对这类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且属当时高档用品的外来产物，结合晚唐五代以来蜀地社会之动向及相关文献记载，可推知其流布入蜀的途径，一方面可能源自官方交往馈赠，如宋人勾延庆《锦里耆旧传》记蜀主王建报谢信物中即有“右件鞍马，及腰带、甲冑、枪剑、麝脐、琥珀、玳瑁、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宝物，其“皆大梁皇帝降使赐”^{〔63〕}。另一方面，自唐末以来，黄河及淮河以北因战乱板荡不安，北民南移活动异常频繁，而社会相对安定的四川盆地自然成为迁徙的重要目的地，如作为唐帝国政治中心的京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当地居民往往迁入蜀中避难，其中亦不乏文士官宦、衣冠世族之类^{〔64〕}，这些人随身携带的日常用具中或就包括有部分价高精美的瓷器^{〔65〕}。值得注意的是，除四川三台外，“官”款三莲瓣口式盘目前也仅见于西安火烧壁窖藏。其次，由于这类瓷器也可能有少量从宫廷或官府中流入民间，故不排除曾由牙倭等作为媒介贩运至各地市场出售，如江南馆街唐宋遗址地处大慈寺附近，而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引《方輿胜览》云：“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66〕}。此外，若考察今江南馆街一带的位置，似也曾处于唐宋时大慈寺范围之内^{〔67〕}，而该遗址所见的“官”款白瓷是一件直颈球腹瓶，从器形上推测应属陈设用瓷一类。有意思的是，如河北定州静志寺、净众院二塔基、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基及韩国庆州黄龙寺等佛教遗迹均出土过为数不少的“官”款白瓷，当中即包括有个别陈设器。就这些情况而言，江南馆街遗址“官”款瓶亦或是佛寺流出之物。

注释：

[1] 景竹友：《三台出土的白定“官”字款瓷器》，《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

[2] 同形“官”款白瓷器另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品中，参见杉村勇造：《辽の陶瓷》，载《陶瓷大系》40，（东京）平凡社，1958年，图四八～四九。

[3]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五代——吴大和五年墓清理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5] 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文物春秋》2005年第5期。

[6] 定州市博物馆：《定州出土定窑双“官”字款枕》，《文物春秋》1997年第2期。

[7] 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7页及400图三之8，文物出版社1984年。

[8][9] a.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墓》，《文物》1972年第8期；

b.穆青：《定瓷艺术》67~9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c.《地下宫殿的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东京）出光美术馆，1997年。

[10] 同注[7] 398页。

[1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第5期。

[12]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8期。

[13] a.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处：《赤峰县大营村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b.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的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14] 郑隆：《赤峰大窝铺发现一座辽墓》，《考古》1959年第1期。

[15] 同注[7]，397页及图版拾肆.3。

[16] 同注[7]，397页。

[1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白音汗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

[18] 韩仁信：《罕大坝辽“回纥国信使”壁画墓的抢救性清理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

[19]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b.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20] 冯永谦：《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21] 同注[7]，397页及400图三之8。

[22] 朝阳地区文物组：《北票扣卜营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23] a.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b.冯永谦：《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第12期。

[24] 铁岭市文物办公室等：《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2号辽墓》，《考古》1988年第9期。

[25]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2期。

[26]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7] 王长启、成生安：《西安火烧壁发现晚唐“官”字款白瓷》，《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7期。

[29]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7卷2期，1999年。

[30] 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

[31]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丘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报》，科学出版社1981年。

[32] a.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

b.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古墓与古窑址》184页，岳麓书社2004年。

[33] 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

[34] 佟柱臣：《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1期。

[35]（韩）文化财管理局、文化财研究所：《皇龙寺·遗迹发掘报告书》，文化财管理局，1984年，245页图9、10。

[36]（日）三上次男着、秦大树译：《中国陶瓷在埃及中世纪遗址中的发现》，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17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37] 河北灵寿县一座唐景福二年（893年）墓中据说也出土有两件“官”白瓷钵，但由于叙述简略且无图片，故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来证实。参见穆青：《定瓷艺术》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8] 表列河北香河出土的墨书“官”字款注碗口沿作六花瓣式，深弧腹，圈足高而外撇，其造型与同省三河县行仁庄辽末金初石函墓（74SJM1）及山西忻州田子茂墓（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同类器一致，推测“官”款白瓷器的烧造或可能要延续到北宋晚期。

[39]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九《废夏州旧城诏》（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1962年，页599：“日者李继迁辄负国恩，荐为边患，鸠率邻国，侵掠封陲。朕不欲加兵……其夏州旧城，宜令废毁，居民并迁于绥、银等州，分以官地给之，长吏倍加抚存。”

[4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古墓与古窑址》332页图40及370页图136，岳麓书社2004年。

[4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42] a.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

b.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3~40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3] a.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丘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81年；

b.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1期。

[44] 湖南长沙窑址曾出土过少量的白瓷器，然其胎质较粗，多呈浅灰或香灰色，白釉作乳浊状，器形包括碗、钵、壶、枕、器盖等。参见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24~27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4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六《王处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47] 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基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第10期。

[48] 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43~181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49] 王丽敏、张建锁：《唐定窑瓷生产规模左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9日第7版。

[50] a.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第12期；

b.李辉柄、毕南海：《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2期。

[51] 孟凡峰等：《河北瓷窑考古的几个问题》，载张忠培等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36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52] 王会民等：《邢窑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月29日第1、2版。

[53] 如《全唐文》中所记之“进瓷器官”可能即属于此。（清）董浩等：《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三，崔沔《代河南裴尹谢墨敕赐衣物表》，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2770页：“臣某言：今日日，进瓷器官某郎行河南尹巩县主簿蒋清还，优奉墨敕，仍赐臣衣一副，瑞锦一端。恩垂北阙，荣照东园，捧戴殊私，载兢载惕，臣某中谢。”按这段记载署名作者为崔沔，崔沔本人于两唐书中有传，其墓志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二者俱载崔氏卒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然“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这一称号乃系天宝八年（749年）所上，此时距崔沔去世时间已十年有余，故该文似不可能出自崔沔之手。又考“河南裴尹”，此称呼另见刘禹锡《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天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一诗及《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令狐楚《代河南裴尹请拜埽表》一文，而刘、令狐二人事迹均多在九世纪前半，故推测《全唐文》中署名为崔沔所作的这段内容所记时间当在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另一方面，“进瓷器官”所在的河南府于《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及《新唐书·地理志》中都有土贡陶瓷器的记载，而前述对《全唐文》内容的推测时间亦可与土贡年代的下限（据王永兴的研究，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土贡时间约于穆宗长庆年间，参同氏：《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相吻合。

[54][58] 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台北）《故宫学术季刊》5卷第2期，1987年。

[5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据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第一百四十六册，食货五二“瓷器库”，中华书局1957年。

[56] 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57] 越窑“官样”款器参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精华》24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此外，四川邛崃十方堂窑址出土的一件粉盒盖模（86QS5YT42：31）拱面亦刻有“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铭文，见陈显双、尚崇伟：《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载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198~199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59] 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载同氏：《中国古代官窑制度》44~4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60] 同注[54]。另外，宿白先生亦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官款瓷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是窑业者直接承接了皇室、贵族的订货，参看同氏：《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基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第10期。

[61] 同注[59]，47~48页。

[62] 资料现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未正式发表。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晓枫女士见告，特致谢忱。另，江南馆街遗址发掘报告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江南馆街唐宋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260~27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63] （宋）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九，载记类。

[64] 顾立诚：《走向南方——唐宋之际自北向南的移民与其影响》，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4）。

[65] 有学者曾参照北宋初年的物价水平，推测“官”款白瓷在当时的价格并不便宜。参见注[54]揭文。

[66]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名胜记第二·川西道·成都府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十一，地理类八，杂记之属。另查《方輿胜览》中相应字句则未记“俱在大慈寺前”，参见（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五十一 906页，中华书局2003年。

[67]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325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